

散 文 精 粹 藏 书 珍 品

唐宋八大家



苏辙

览千古名句

赏万世绝唱

凭临古文极顶

俯仰天高地阔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唐宋八大家

苏
轍

吴永哲 乔万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乔万民主编,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1-03742-0

I. 唐... II. 乔... III. 唐宋八大家—古典散文—选集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18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发行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375 印张

字数:196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95.00 元

出版说明

经常阅读优秀的古文，一般会有三个层次的体验：第一层是感染于文章的气韵、风致，心神为之一爽；第二层是读后掩卷会心，觉得我们平日苦心思索、品味所得到的一些理性结论，先哲早已有了详备的论述；第三层是多读细读之后，再反复咀嚼，几经出入，便如登高而望，世情、人事当中的很多道理仿佛一一陈列目前，顿感视野开阔，胸襟豁然。此外，虽时事沧桑，先哲迹远，常读其书，可以打破时空局限，如闻良师教诲，如同益友倾谈，收获与日俱增。

中国的古文从《尚书》以及先秦诸子百家开始，经两汉而发扬光大，至唐宋则诸体兼备，集其大成，八大家散文无疑是古文全盛时期的精华。所以至今学者论及古文，最推重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最多的也非八大家莫属。

纵观众多选本，其中大多数是早被公认的名篇佳作，所选之精无需挑剔。但要从中完整地了解他们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以及艺术技巧，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把他们的作品全集拿来一一注释、解读，又未免失之繁杂、冗赘。为求其体气完备，使读者既得其精华，又可览其全貌，我们选编了这套《唐宋八大家》。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每篇古文，编注者于每家作品选之前载其生平事迹及文学成就，在参考众家成说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脉络清晰、详略得当；之后附有史书本传，以备读者参考、辨析；在每篇之前尽可能标明写作年代，以便读者在对照其生

平事迹之后掌握文章写作的具体背景，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该篇作品的思想内涵；同时附有编注者对每篇文章的概括理解，力求为读者更便捷地了解每篇作品的主题和写作技巧提供有效的导引。

在注释方面，编注者通过大量的考据工作，对每篇作品当中的生字生词予以尽可能详尽、准确地注解；对作品当中的大量典故进行了多方查证，较为详尽地标明了每条典故的出处、本意、转义以及在文中所表达的现实含义，从而使读者在准确理解作品的基础上还可借此掌握更多的典故知识。

就此而论，这应当是一套既能为一般读者了解唐宋八大家古文提供导引，也能为有志于研究唐宋八大家及其古文的学者提供一定借鉴、参考的读物。

学不可凭悟而得，气可以涵养而至。读八大家文章，不仅可以领略中华文学宝库的精华，增长知人论世的本领，养成纵贯古今的浩然之气，还可以通过充分揣摩、咀嚼其为文的章法、技巧，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相信随着读者对八大家古文涉猎深浅的不同，会得到或多或少的益处。

《唐宋八大家》编注者
于公元 2001 年元月

苏辙生平及创作简介

苏辙，四川眉山人，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号颖滨遗老，谥文定。他是苏洵最小的儿子，是苏轼的弟弟，与他的父兄一道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三苏”。苏辙生于宋仁宗至元二年，对此，他的哥哥苏轼记得最清楚，六十年之后，他还作赋赠物以祝贺弟弟的生日。苏辙生于己卯，苏轼曾称呼他为“卯君”。

苏辙少时与哥哥苏轼一同就学于四川眉山的学者刘巨。他当时在眉山一带以教授为业，从游者至百人。苏洵命两个儿子跟他学习，受益匪浅。后来，母亲程氏为苏轼、苏辙二兄弟讲学，教育他们要以古代的名士为榜样，坚守道义，刚直不阿，对苏辙兄弟后来处世的品性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辙与哥哥苏轼少年时代就感情甚笃，这种友谊一直保持终生。苏辙说苏轼对他是“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东坡先生墓志铭》）。而苏轼也说苏辙“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初别子由》）兄弟二人少时一起读书，苏轼读书每有心得，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苏辙言之，可谓知苏辙甚深。

苏洵赴京考试落第后返回故乡，绝意功名，潜心读书，同时精心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写了一篇《名二子说》，对两个儿子的前程作了一番预测，表达了他对两个儿子未来前程的希望。他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

苏辙

所者为。虽然，去轼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的这篇文章，对他两个儿子的未来预测得确实比较准确。苏轼一生豪放不羁，锋芒外露，确属“不外饰”那种类型的。结果他的一生坎坷异常，屡遭贬谪，因文字得罪，几乎被杀。而苏辙一生冲淡平和，含而不露，在官场中虽几经沉浮，但始终处于“祸福之间”，最后在隐居中度过了晚年。

苏辙在少年时就体现出了写作的天才。一日，苏轼与苏辙各作了一篇文章，苏轼作文的题目是：《却鼠刀铭》，而苏辙写的是《缸砚赋》，父亲苏洵看完后，赞赏苏辙的这篇文章写得好，命他用好纸修改誊写，装饰好了以后钉于他所居住的墙壁之上。

苏轼年十九岁取了当地青神的王弗为妻，第二年，苏辙娶了比他小两岁的史氏为妻，那一年他十七岁。

宋仁宗至和元年，张方平出守成都。苏洵带着他写的著作以布衣身份前往拜见，得到了张方平的极大赏识。在张方平等人的劝说和推荐下，苏洵决定再到京师寻求入仕的出路，更主要的是陪着他的两个儿子到京城应试。苏洵在《上张侍郎第一书》中写道：“洵有二子轼、辙，韶齿授经，不知他习，进趋跪拜，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

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入京师。”

嘉祐元年三月，苏辙随父兄一道入京赶考。他们父子三人首先来到成都拜别张方平。苏轼以前曾陪苏洵来成都拜见过张方平，而苏辙这次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父亲的恩公。张方平不仅对苏洵有知遇之恩，而且还发现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罕见的人才。苏洵曾请教张方平，他的两个儿子从乡举考试开始可不可以。张方平披阅了苏轼和苏辙的文卷后说：“从乡举，乘骐驎而驰闾巷也。”他认为苏洵二子直接参加朝廷设立的六科考试，“犹不足骋其逸力尔。”《瑞桂堂暇录》中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苏氏父子入京前到成都拜谒张方平，当时苏轼、苏辙刚刚学习怎样应对制科考试，张方平与兄弟二人谈话后，甚奇之。第二天，张方平忽出六题，令人交给苏轼、苏辙，让他们兄弟二人按题作文，而张方平悄悄在壁间窥视他们。兄弟二人得题后，各坐致思。苏辙得题后有疑惑之处，指着题让苏轼看。苏轼也不搭话，只是举笔倒敲桌子，意为《管子》注。苏辙疑而未决，又指着第二题让苏轼看，苏轼挥笔勾去。两个人再也没说话，开始专心答题。写完后交上来，张方平阅后甚喜。勾去的那一题，是没有出处的，张方平只是有意试试他们。第二天，张方平对苏洵说：“你的二子都是天才。长者明敏尤为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后来苏辙做官果然比苏轼大。从那以后，苏轼、苏辙兄弟都深爱张方平，而苏辙感激尤深，他曾写道：“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张方平）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

苏洵父子带着张方平等人写给欧阳修的举荐信离开成都，

苏辙

经阆中，出褒斜谷，又经过横渠镇、凤翔驿，过长安，出关中，五月抵达京师。适值京师发大水，直到秋天水退，他们才见到了欧阳修等人。

当时，苏轼与苏辙年纪轻轻，初来京师，几乎无人知晓。他们兄弟俩住在开封兴国寺专心应考。父亲苏洵忙于在外边干谒达官显贵。通过苏洵，苏轼兄弟二人认识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极大赏识。梅尧臣在赠给苏洵的诗中写道：“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盛赞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是雏凤凰，高翔于百鸟之上。

嘉祐二年正月，欧阳修以礼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贡举，结果，苏轼、苏辙兄弟双双考中。然后又经过宋仁宗的“御试”，苏辙赐同进士及第，苏轼赐进士及第。仁宗回宫后高兴地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

苏洵看到自己亲手培养的两个儿子皆中高第，实现了自己多年梦寐以求而难以实现的夙愿时，心情复杂地说道：“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史阙》）。

三苏父子一时名动京师。

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写道：“当至和、嘉祐之间，（苏洵）与其二子轼、辙偕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得其书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之文章遂擅天下。”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也写道：“嘉祐初年与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父，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

正当苏洵父子三人在京师春风得意之时，噩耗传来，苏轼、

苏辙的母亲程氏在家中亡故。父子三人仓卒返回四川。

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氏父子三人再次出川赴京。这一次他们走的是水路。他们带着全家人，乘船沿岷江、长江而下，经过嘉州、犍为、渝州、忠州等地出三峡，至江陵，然后又从陆路北上的，经过襄阳、许州等地，于嘉祐五年二月抵达京师。

一路上父子三人饮酒作诗，访游名胜，沿途的许多地方官也前来会见他们，陪着他们游玩，十分热情。这一路上，父子三人唱和较多，他们将这些作品编到一起，名为《南行前集》，《南行后集》。苏轼在《南行前集》叙言中说：“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南行前集》早已失传，但其中所收诗赋大部分保存下来了。其中，苏辙诗二十三首，赋两篇。

苏洵父子回到京师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但欧阳修等人推荐他们参加制科考试，所以兄弟二人没有赴任，一心准备应付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同时参加制科考试。当时一同前去应试者甚多。一天，宰相韩琦与客人们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一传出，不敢应试而去者十有八九。那时，朝廷所设的制科考试一般都在八月中旬举行，但突然间苏辙得病卧床不起，自料赶不上参加考试了。宰相韩琦得知后，向皇帝禀奏说：“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他请求皇帝将制科考试的时间向后推迟一下。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苏辙在病中，韩琦数次派人寻问他是否

苏辙

康复。直到苏辙身体完全康复，制科考试方才举行，比正常的考试日期推迟了二十天。从那以后，朝廷的制科考试改在了九月。

考试的那一天，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各携一端砚进入考场。据《四朝闻见录》、《吹剑录集》等书中记载，苏轼进了考场，一看题目，知道弟弟苏辙肯定记不起“礼义倍足以成德”这句话的出处了。正巧一位老兵给他倒砚水时溢了出来，苏轼于是装作生气的样子喊道：“小人哉”。苏辙一下记起了这句话出自《论语》“樊迟请学稼”下边的注中。

苏轼、苏辙兄弟又双双通过了制科考试，苏轼的名次遥遥领先，而苏辙却出了点问题。他在应试的文章中认为仁宗春秋已高，或倦于勤，因而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他写道：“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蒿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虫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

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

这篇策对送上去之后，连苏辙自己都觉得言辞过于激烈，自认为必被废黜。当时司马光为考官，将他录取，列为三等，身为三司使的蔡襄说：“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只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的文章大不逊，请求废黜他。宋仁宗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他以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王安石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书，对苏辙的这篇策对大为不满，认为他专攻人主，不肯为他撰词。正好这时他的父亲苏洵奉朝命以霸州文安县主簿的身份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在京师同修《礼书》，苏辙便请求留在京城养亲，而他的哥哥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判官，前去赴任了。三年后，苏轼还京，苏辙前往大名任推官。

宋英宗治平三年四月，苏洵修完《礼书》，在京城去世，苏辙与哥哥苏轼一道送父亲的榇柩返川，并为父守丧。守丧期结束后，英宗已死，神宗已立位二年了。苏辙上书言事，提出了去“三冗”，即去除冗吏、冗兵、冗费以丰朝廷之财。他的这一政见得到了神宗皇帝的重视，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了，并任命他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当时，王安石正在朝中执政，与陈升之共同掌管三司条例事物，命苏辙为他的下属。吕惠卿当时正依附王安石，苏辙每与他讨论事务，两人的意见多相抵触。

王安石准备推行新苗法，让苏辙认真地议一议，并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请直言相告。”苏辙回答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

苏辙

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糴，有贵必糶，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现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王安石听了以后说：“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一个多月不谈青苗法的事情。后来，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与王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被推行。王安石派人到四方调查，朝野上下知道这些使者必迎合生事，都不敢说实话。苏辙找到陈升之说：“昔嘉祐末，遣民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他又给王安石上书，力陈其不可行。王安石大怒。准备给他加以罪名，陈升之阻止了王安石，将苏辙放出朝廷，任河南推官。当时张方平知陈州，请他任教授。

苏辙的哥哥苏轼也离开京师，到杭州任职，途中到陈州会见于苏辙，在那里住了七十多天。苏辙家里很穷，孩子又多，生活很拮据。当时苏辙全家住在一栋低矮的小房子里，而苏辙的个子又长得很高，苏轼就开玩笑地说他的弟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苏辙与苏轼闲来无事常去柳湖划船或到郊外散步，共同探讨时局和政治问题，苏辙常常劝哥哥苏轼不要在宾客面前把自己的想法都过分坦白地说出来，而苏轼却说“我心中有不平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

熙宁六年，苏辙改住齐州掌书记，熙宁十年又到张方平幕府任南京签书判官。

元丰二年（1079），苏辙兄苏轼受到朝中小人的诬陷，告发他以诗讥讽朝廷，朝廷派人前往湖州羁押苏轼回京下狱。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往甚厚，秘密派人赶往南京通知苏辙。苏辙闻讯大惊，急忙派人前往湖州通知苏轼。前往押解苏轼的官吏带着儿子同行，因儿子途中生病耽误半日，苏辙派去的人抢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苏轼。

苏轼被朝廷来的官吏押送回京师，途中，押送他的船在太湖鲈香亭下修桨。那天晚上，风涛倾倒，月色如昼。苏轼不知道自己罪行有多重，本想跳进湖中，一死了之。又转念一想，自己这一死，弟弟子由必不能独生于世，这不是太辜负弟弟了吗？想到此，苏轼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被关入御史台监狱。儿子苏迈每天都到狱中探望他，为他送饭。苏轼和儿子约定，万一有什么坏消息就送鱼来。有几天苏迈出城借款，让一位朋友代为送饭。这位朋友不知就里，给苏轼送去了几条熏鱼。苏轼以为事态恶化，难逃一死，就写了两首诗，托一位平时对他很友善的狱卒转交给弟弟苏辙。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首诗写得悲悲切切，表达了对弟弟苏辙恋恋不舍的深情。苏辙读罢哥哥的这两首诗，伏案痛哭。后来，这两首诗层层上达到皇帝手中，皇帝看后也大为感动，后来苏轼获释，这也是原因之一。

在苏轼得罪下狱期间，苏辙给朝廷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

苏辙

职为哥哥赎罪。后来他因苏轼的案子遭到贬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酒税，五年不得调升。苏辙监酒官的办公室位于临河的一座小破屋中。过去一共有三个官吏在这里办公，苏辙到任后，另外两个官吏都罢职而去，大事小情都要由苏辙一个人来办。苏辙记叙当时的情景是：“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夜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在那段时间，苏辙不断练习瑜珈术。他童年多病，夏天消化不良，秋天咳嗽，吃药也不见效，自从习练瑜珈术，身体渐渐好了。他还把修练瑜珈术的心得教给了哥哥苏轼。

元丰七年，苏辙改任歙州绩溪（今属安徽）令。

宋哲宗登基，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辙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机。他被召回京师，先任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任右司谏，后迁中书舍人，改任户部侍郎。整个元祐时期，苏辙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他身居要位，历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

当时哲宗刚刚十岁，高太后垂帘听政，马上起用了司马光、吕公著为相，准备革除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弊端，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原样。而过去的丞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惇等人还都在位，窥测时机，以求一呈。苏辙上言，请求朝廷将他们逐出贬谪。朝廷中还有一个叫吕惠卿的人，一开始极力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后来看到王安石大势已去，则全力倾陷王安石，一朝反目，甚于仇讎。吕惠卿人品恶劣，依靠王安石的势力，一步步爬上了丞相的高位。一旦大权在握，吕惠卿就翻脸不认人，告发王安石蓄图谋反，后来又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交给了皇帝，其中有好几封信，王安石都写着：“无

令上知此一贴”的字样。神宗开始对王安石大为不满，王安石被迫自请罢相。吕惠卿恶名远扬，为天下人所不齿。哲宗立，吕惠卿自知不妙，便避重就轻，企图在朝廷中能保住一个位置。苏辙上疏，陈述了吕惠卿重重奸险之状，朝廷终以散官将其发置建州。

司马光执政后，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雇役法害处甚大，准备恢复差役法。苏辙与司马光相交甚厚，但他认为雇役法和差役法两相比较各有利弊，恢复差役法，应慎重考虑，然后实施。

司马光还对王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的作法十分不满意，准备改变王安石科考的办法，实行新的方式。苏辙劝告司马光说：“进士来年秋试，所剩时间不多了，而改革科考的办法一时还议而难决。诗赋虽属小技，但比次声律，也须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总之，来年不可轻易施行新的科考办法。来年的科场考试还是一切如旧的好。唯有经义可兼取注疏及诸家之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的科举格式，未为晚也。”遗憾的是，苏辙的这些比较稳妥的建议，司马光都未予采纳。

北宋长期边患不绝，宋神宗时，乘夏国内乱之机，宋朝以兵攻讨，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寨。哲宗登位，夏国派使者前来祝贺，使者还，还未出境，又派使者入境。宋朝知道夏国有请求归还兰州五寨的意图，大臣们议论不休，或弃或守，各有主张，一时难有定议。苏辙立主还地，以求和平。苏辙的建议被朝廷采纳，答应归还五寨，西夏才暂时安定下来。

苏辙还多次提出了赈济饥民，免除积欠，裁减浮费等项改

革政见。

自元祐初年朝廷推行新的政令，到元祐五年人心已初步稳定。但元丰时期的旧党仍分布朝廷内外，不甘心失败，经常无中生有，以异端邪说摇撼在位者。朝廷执政者吕大防、刘摯以为心患，准备引用一些元丰旧党，以平夙怨，叫做“调停”。宣仁后迟疑难决。苏辙对这种所谓的调停持强烈反对态度。他上疏说：“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难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疎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其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这封奏疏呈上之后，宣仁后命执政宰相读于帘前。她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是邪恶小人和正人君子兼而用之，他所说的极为有道理。”诸位大臣们都随声应和，关于“调停”的说法便不再被提起。

西夏与北宋的关系一直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因此，对西夏采取何种对策，一直是北宋大臣们争论的焦点。哲宗立，西夏派使者前来祝贺登极，请求和谈，并商议划定地界事宜。宋朝向西夏作出了许诺：划定地界，每月赐给西夏钱物等。但时间过去了很久，这种许诺并没有被付诸实施。第二年，西夏派兵袭击泾原，杀掠宋朝的弓箭手数千人。宋朝隐忍了这种挑衅行为，派使者前往西夏赐策命。西夏人在接待宋朝使者时特别傲慢。他们指责宋朝划分地界不公平，不再派使者回谢，并